

历代名著精选集

〔宋〕黎靖德 编

黄坤 曹姗姗 注评

疏雨明窗夜
長流中有畫
生香篇事此日
百射頑雲水
身處處狂雷
靜分丈鏡
連書推聽
誠我上增
遂龍振霞
林高子選

朱子语类

历代名著精选集

[宋]黎靖德 编
黄坤 曹姗姗 注评

朱子语类

 凤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朱子语类 / (宋)黎靖德编 ; 黄珉, 曹姗姗注评
— 南京 : 凤凰出版社, 2013.9
(历代名著精选集)
ISBN 978-7-5506-1867-1

I. ①朱… II. ①黎… ②黄… ③曹… III. ①朱熹
(1130~1200) — 哲学思想 — 研究②《朱子语类》 — 注释
IV. ①B244.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01173号

书 名	朱子语类
著 者	(宋)黎靖德 编 黄 珉 曹姗姗 注评
责任编辑	樊 昕 吴 琼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025-83223462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fhcs.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照 排	南京凯建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中国江苏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尧新大道399号,邮编:210038
开 本	960×1304毫米 1/32
印 张	7.625
字 数	227千字
版 次	2013年9月第1版 2013年9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06-1867-1
定 价	22.00元 (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电话:025-68037411)

前 言

朱熹是宋代理学的奠基者，也是理学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十分重视教育，在知南康军任内，重修位于庐山五老峰下的白鹿洞书院。白鹿洞书院与河南登封的嵩阳书院、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河南商丘的睢阳书院，并称宋代四大书院。朱熹门下弟子众多，平日言传身教，不遗余力。他和弟子的问答之语，基本上都保留在《朱子语类》之中。

宋宁宗嘉定八年(1215)，蜀人李道传取廖德明等三十三家所记，刻于池州，成池刊《朱子语录》四十三卷(池录)；理宗嘉熙二年(1238)，道传之弟性传续取黄榦等四十二家所记，刻于饶州，成饶刊《朱子语续录》四十六卷(饶录)；理宗淳祐九年(1249)，建安蔡杭又哀杨方等二十三人所记，亦刻于饶州，成饶刊《朱子语后录》二十六卷(饶后录)；度宗咸淳元年(1265)，天台吴坚采以上三录未收者二十九家，又增补未刊四家，刻于建安，成建刊《朱子语别录》二十卷(建录)。与此同时，也有弟子将朱子语录分类编辑，以“语类”之名刊行于世。嘉定十二年(1219)，莆田黄士毅取七十家语录分类编排，眉山史公说刊于眉州，成蜀刊《朱子语类》一百四十卷(蜀本)；淳祐十二年(1252)，王似续作类编，刊于徽州，成徽刊《朱子语续类》四十卷(徽本)。

以上四种《语录》、两种《语类》详略不同，互有出入，且又翻刻不一，文字差脱，讹舛滋多，难惬人意。即使有“精善”之称的“池录”，也不免有误。导江黎靖德有感于“子洪(黄士毅)所定门目颇精详，为力靡矣；廉叔刻之，不复雠校，故文字甚差脱，或至不可读。徽本附以饶录《续类》，又增前类所未入，亦为有功；惜其杂乱重复，读者尤以为病。而饶《后录》新增数家，王公或未之见，未及收也”，乃以黄士毅《语类》为本，参校诸书，“遗者收之，误者正之，考其同异，而削其复者一千一百五十余条”(《书朱子语类目录后》)，于咸淳六年(1270)，编成《朱子语类大全》一百四十卷，洋洋二百

多万言，成为后来《朱子语类》的通行本。

相对之前的各种《语录》、《语类》，黎靖德本堪称完备。但即使在当时，还是有一些朱熹语录已经失传了。蔡杭在编录时特别感到遗憾的是：“先师（朱熹）又有亲自删定与先大父西山（蔡元定）讲论之语及性与天道之妙，名曰《翁季录》者，久未得出以流行于世。岂斯文之显晦固自有时乎！”（饶刊《朱子语后录后序》）

“池录”由黄榦编定，但他也只是根据李道传提供的材料进行校雠，黄士毅听他亲口说：“欲求元本刊改，而未能也。”（《朱子语类后序》）黄榦为朱熹女婿，可也找不到语录原本了。现存朱熹语录，惟有辅广所录，由朱熹亲笔改定（吴坚建刊《朱子语别录后序》）。由于经过他人传抄，并非朱熹手定文字，不免有失真失误和可疑之处；各人的记载，也有相互矛盾之处。即使如此，《朱子语类》依然是研究朱熹学术思想必不可缺的珍贵资料。黄榦指出有些语录虽然“未必尽得师传之本旨”，“且谓不可以随时应答之语易平生著述之书”，但也认为：“先生之著书多矣，教人求道入德之方备矣。师生函丈间，往复诘难，其辨愈详，其义愈精，读之竦然，如侍燕闲，承警欬也。历千载而如会一堂，合众闻而悉归一己，是书之传，岂小补哉！”（池刊《朱子语录后序》）

程颐弟子尹焞曾得同门朱光庭所抄《杂说》呈送老师，问道：“此书可观否？”过了半个月，没有回复，又去请问，程颐说：“某在，何必观此？若不得某心，只是记得他意，岂不有差？”（《师说下》）朱熹认为程颐这话，是说看语录不如当面讲更清楚，只是尹焞误会了老师的意思，才说语录之类没必要看。“伊川固云某在不必观，今伊川既不在，如何不观？……夫子所自作者，《春秋》而已，《论语》亦门人所记也。谓学夫子者，只当看《春秋》，不当看《论语》，可乎？”（《语类》卷第一百一）被康熙帝誉为“本朝理学儒臣第一”的陆陇其说：“章枫山（明代学者章懋）谓《朱子语类》一书虽出门人所记，不敢谓其字字句句皆无差误，而其中所载，大而天地鬼神之奥，小而一事一物之宜，凡所以穷理修身应事接物与夫治国平天下之道，靡所不备，大有功于后学，信哉！薛文清（明代学者薛瑄）谓读《朱子语录》杂书，断不若读其手笔之书。然手笔之书亦有得《语录》而益明者，文清特恐人不知采择而为此言耳。”（《松阳钞存》卷下《观圣贤》）李性传认为问题不在

是否可观，而在如何观：“愚谓《语录》与《四书》异者，当以书为正，而论难往复，书所未及者，当为助。与《诗》、《易》诸书异者，在成书之前，亦当以书为正；而在成书之后者，当以语为是。学者类而求之，斯得之矣。”（饶刊《朱子语类后序》）这种看法，还是可取的。

语类即分类辑的语录。黎靖德依据的黄士毅所定《语类》门目，分为二十六门，依次为：理气、鬼神、性理、学、大学、论语、孟子、中庸、易、尚书、诗、孝经、春秋礼、乐、孔孟、周程张邵朱子、吕伯恭、陈叶、陆氏、老氏、释氏、本朝、历代、战国汉唐诸子、杂类、作文。基本上涵盖了朱熹学术思想的全部内容。当代学者钱穆的《朱子新学案》，大致沿袭了这样的分类。

对于这种分类次序，黄士毅作过一番说明：“既以类分，遂可缮写，而略为义例，以为后先之次第。有太极然后有天地，有天地然后有人物，有人物然后有性命之名，而仁义礼智之理则人物所以为性命者也。所谓学者，求得夫此理而已。故以太极天地为始，乃及于人物性命之原，与夫古学之定序。次之以群经，所以明此理者也。次之以孔孟周程朱子，所以传此理者也。乃继之以斥异端，异端所以蔽此理，而斥之者，任道统之责也。然后自我朝及历代君臣、法度、人物、议论，亦略具焉。此即理之行于天地设位之后，而著于治乱兴衰者也。凡不可以类分者，则杂次之，而以作文终焉。盖文以载道，理明意达，则辞自成文。后世理学不明，第以文辞为学，固有竭终身之力，精思巧制，以务名家者。然其学既非，其理不明，则其文虽工，其意多悖，故特次之于后，深明夫文为末，而理为本也。”（蜀刊《朱子语类后序》）

《朱子语类》首论理气，这是因为理气说是理学思想体系的基础（或者说柱石）。借用现在的话说，理气说是对宇宙本原的探讨。朱熹的自然哲学，乃综合了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张载的《西铭》，特别是二程的理气说而成。“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天地），两仪生四象（金、木、水、火），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周易·系辞上》）“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太极图说》）太极为天地万物之本，而又存在于天地万物之中。太极之中，万理毕具，万物毕备。朱熹说：“太极只是一个‘理’字。”（《语类》卷一）“总天地万物之理，便是太极。”



(《语类》卷九十四)太极为形而上的理,阴阳五行为形而下的气(器)。理为生物之本,气为生物之具。理为精神、形式,气为物质、材料。

太极、天地、鬼神,都是些和宇宙本原有关的命题。《语类》在“理气”这个大标题下,记录了不少相关的论述。朱熹认识到宇宙万物出自阴阳二气的化育,是由物质运动形成的;宇宙无穷无尽,大地是位于天空中的一个实体;月亮本身并不会发光,月光只是阳光的反射;日食是日为月所掩,月食是月被日遮盖;潮汐与月亮的引力有关;通过山上的化石可推断地质的演变;根据山脉的走势可判断水的流向……这些看法,都是朱熹敏锐观察和精湛思辨的结晶,显示了超越时代的科学精神和不同寻常的卓见远识。以今人的标准看,其价值远远高于连篇累牍的关于理气的论述,本书“理气太极天地”部分选录的内容,也以这方面居多。

《易·说卦》:“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以天、地、人三者并立,称作“三才”。阴阳互补,五行互用,不仅表现在自然界,也体现于人事之中。天地人三者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关系。谈天说地之后,必然要论人。朱熹认识到:人并非出自上帝创造,同样是物质运动变化的结果,鬼神不过阴阳消长而已,因此人的生死,也是一种物质转换的现象;先辈会一代接一代死去,但遗传基因始终存在,生命因此而演进;迷信,往往出于对生活不安而产生的恐惧。

对理学家来说,如何做人,是一个比人从何处来更重要的问题。因此,继自然哲学之后,《语类》记录了朱熹有关人生哲学的论述。讨论立人之道,首先要对人的本性有一个明确的认识。《中庸》说“天命之谓性”。朱熹的解释是:“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犹命令也。”(《中庸章句》)这就是说:性是人的自然禀赋,寓于形体(气)之中,而其内核则是理,性即理。人与其他动物的区别,就在秉承了理。世上无不善之理,因此,人之初,性本善。能否成为一个完美的人,全在能否发现自己的本性,发掘自己的潜力。朱熹一再说:“自古圣贤相传,只是理会一个心。”(《语类》卷五)性以心为载体,情(无论是孟子所说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端”,还是《中庸》所说的“喜怒哀乐”)则都是心的活动。

解决了人性的问题,接下来便是人为的问题。故继心性论后,便是道

德论。于此，朱熹特别重视“诚”、“敬”二字，认为“敬字工夫，乃圣门第一义”（《语类》卷十二）。诚在内心，敬在外表；诚是品质，敬是行为。董仲舒以仁、义、礼、智、信为“五常之道”，即常行不懈的为人之道。朱熹也说：“人只是此仁、义、礼、智四种心。”（《语类》卷六）孔子的学说即是仁学，五常也以仁为先。仁是理应如此，义是按理去做；仁发自内心，义付之行动。义在仁与爱之间起着传输的作用。

朱熹的道德观，又与他的认识论密切相关。他十分赞赏程颐的两句话：“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认为二者相辅相成。致知穷理的过程，也是求学治学的过程。《论语》以“学”开篇。由于人之初，性本善，故孟子说“人皆可以为尧舜”。但实际上尧舜与桀纣并存，伯夷与盗跖同在，人与人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别，则和后天的教育有关。人的本性需要涵养，人的行为需要引导，这都离不开教育。“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礼记·学记》）故《语类》在人生哲学后，继之以教育思想。

朱熹认为：只要以圣贤为己任，尽自己的能力，尽自己的责任，凡人皆可为尧舜。因此，他论学，首先是勉励人立志，做任何事都得靠自己。要有忧患意识，有紧迫感：“如居烧屋之下，如坐漏船之中！”“不要等待。”他看到：“为学不进，只是不勇。”因此更要有一种精神，“阳气发处，金石亦透。精神一到，何事不成！”（《语类》卷八）志趣务必高远，但也必须重视细节，因为细节会成为决定成败的要素。学习、工作，究竟是为自己，是出于自身的兴趣和追求，还是为别人，是出于外界的压力和驱迫？这个区分，会成为决定日后是否成功的关键。为学应该看作是自己该做的事，爱做的事。如果不是为了自己，仅仅为了求个名声，图个脸面，将学习作为一种摆设，那不过是自欺自娱而已。朱熹还提出：求学必须心有所主，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即有个明确的目标，而且是值得追求的目标，“切须去了外慕之心”（同上）。只有这样，才不会将时间和精力，白白耗费在追求的过程之中。他以引路人自居，重视启发式教育，事事要求学生“自去理会，自去体察，自去涵养，书用你自去读，道理用你自去究索”（《语类》卷十三）。朱熹论“为学功夫”，其中有些内容，即使在今天，也是针砭时弊的良药。

朱熹的认识论,出自《大学》的格物致知说,必然以即物穷理为第一事,而“读书乃学者第二事”。一部《朱子语类》,几乎囊括了他对所有重要问题的论述。朱熹自己最看重的不是读书法,在他眼中,理气说,太极说,心性说,乃至对四书五经的注述,都比这重要得多。不过,在今人看来,能够经受时间汰洗,依然开启心智的,反倒在这些记录读书心得的片言只语之中。朱熹指责陆九渊不需读书的说法是误人之说,认为“书那有不可读者?只怕无许多心力读得”。他提出读书的九字诀“眼头过,口头转,心头运”;指出“读书,须是看著他那缝罅处”;认为读书如“吃果子一般……须是细嚼教烂,则滋味自出,方始识得这个是甜是苦是甘是辛,始为知味”。批评当时人“才把书来读,便先立个意思,要讨新奇,都不理会他本意著实,才讨得新奇,便准拟作时文使”;以致“今之学者,看了也似不曾看,不曾看也似看了”(《语类》卷十)。他还指出:“今之谈经者,往往有四者之病:本卑也,而抗之使高;本浅也,而凿之使深;本近也,而推之使远;本明也,而必使至于晦,此今日谈经之大患也。”(《语类》卷十一)直到今天,这些问题依然是治学的大患。也许可以说,包含在论“学”部分的“读书法”,是《朱子语类》中对今人最有借鉴意义的内容。

认识必须付诸行动,该做的“只有两件事:理会,践行”。朱熹主张“知行相须”,就次序而言,知先行后,但在二者之间,朱熹又明确表示更重行:“学之之博,未若知之之要;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实。”(《语类》卷十三)既然重行,就不能轻忽,而必须力行,“把定生死路头”,“致知、力行互相发”(同上)。

读书固然要重视方法,但更重要的还是读什么书。理学家以传道者自居,而所传之道为孔孟之道,读书当然首先得读圣人之书。五经为孔子编定之作。朱熹谓孔孟之道,一脉相承,孔子传于曾子,曾子传于子思,子思传于孟子。曾子作《大学》,子思作《中庸》,朱熹将《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合称“四书”,也隐含儒家道统之意。理学思想的源头是四书五经,而四书又是五经之阶梯,故治学应以四书为先。朱熹认为《大学》为初学入德之门,是为学纲目,《中庸》乃孔门传心之法,其功力有深浅,因此,他编辑并要求学者攻读的次序为:《大学》、《论语》、《孟子》、《中庸》。朱熹说自己于“《大学》用功甚多”,平生精力,尽在注释此书。

朱熹以毕生精力，从事对四书五经的训释工作，如《四书章句集注》、《四书或问》、《周易本义》、《诗集传》等，凝结着他多年的心血，均为旧时学者必读的不刊之作。《语类》中有关四书五经的论述，很多和这些专著重复，又不如这些书严谨，虽然篇幅多达七十九卷，占一半以上，但被人重视的程度反倒不够。清初理学家张伯行的《朱子语类辑略》，在这部分只字未录。

朱熹强调“学者不可用己意迁就圣贤之言”；“学者不可只管守从前所见，须除了，方见新意。如去了浊水，然后清者出焉”；“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语类》卷十）。从思想史的角度看，朱熹有关五经的论述，最有价值的是疑古、惑经的内容。朱熹治经，始终反对穿凿附会，妄作臆断。他说《易》本是卜筮之书，而包括程颐在内的当时众多学者，却不肯正视这个问题，故意将《易》拔高，结果只是说了一番空洞笼统的大道理。他首先指出今、古文二书的同异，开后世《古文尚书》辨伪的先声。《尚书》中的《禹贡》，是古代地理学的经典著作，朱熹根据自己的实地勘察，发现《禹贡》中有关南方地理的论述与实际“全然不合”，提出研究地理，不仅要看以往的记载，更应重视当今的实际状况，实地考察，远比纸上功夫重要。他甚至说：“《书》中可疑诸篇，若一齐不信，恐倒了六经。”（《语类》卷七十九）朱熹认为《诗小序》出自汉儒，凿空妄言，以诳后人，其间谬误，不可胜言，破除了《诗》三百都合礼义、都有美刺的说法，在《诗经》研究领域开拓了一种新的风气。在朱熹看来，《春秋》主要还是一部史书，应该和其他历史著作同样看待，因此他不同意“先儒所言，字字有义”的看法。古代儒家，尤其重礼，朱熹认为古礼繁文缛节，后人实难遵行。甚至对研究古礼，也不以为然。钱穆说朱熹论《易》为卜筮书、《古文尚书》为伪作、《诗小序》不可信，乃经学史上的三大卓见。

韩愈在其《原道》篇中，提出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至孔子、孟子的道统说，并说孟子死后，道统断绝。宋代理学家认为自己就是孔孟之道的继承者，对道统尤为重视。朱熹以北宋五子（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直接上承孟子，故《语类》在“四书五经”之后，便是对北宋五子之书及其门人言行的论述。

朱熹是程颐的三传弟子，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语类》所载的道

统,便止于朱熹。他说大学之道的八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为学入德的阶梯。前面六目,基本上已见于理气说、心性说等论说之中,因此这里载录的,都是有关治国平天下的论述,包括论治道、论取士、论兵、论刑、论民、论财、论官等内容。至于外任、内任两卷,则是关于朱熹在地方和朝廷任职时的政绩和言论的记载。其中有对赈济的运筹,对弱者的体恤,对教育的重视,对刑罚的把握,对贪赃的愤慨,对豪强的抑挫,也有谈举才的原则,兵政的弊端,钱币的使用……读后可对朱熹的政治思想,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

黄士毅本为朱熹弟子,“语录”也是汇集众弟子的记录而成,《语类》以朱熹“训门人”作为这部分内容的终结,也包含着众弟子继承儒学道统之意。朱熹说自己治学,全得力于一个“勤”字。他教育弟子,做人不可不弘毅,要“硬着脊梁骨”;世上决没有“人不能而我独能之事”,任何人不可妄自尊大;“尊德性”和“道问学”不可偏离,“致广大”须从“尽精微”做起;知识应该融入生活,理论必须联系实际;治学须透脱颖悟,融会贯通,不可心有窒碍,拘泥不变;读书不能承虚接响,如矮子看戏,只是随人妄说短长。

吕祖谦开金华学派(婺学),提倡经世致用;陈亮开永康学派,力主事功之学,反对理学家空谈性理;陆九渊为心学的代表人物,认为心即宇宙本体,为学应先“尊德性”,与朱熹主张先“道问学”不同。这三人都为朱熹的朋友,吕祖谦、陆九渊也可称为程朱学派之外的理学家,但与朱熹的思想观点颇有分歧。正应了“道不同,不相为谋”这句话,朱熹对三人都有不满之词,有时言词还不免偏激。《语类》将这三人置于道统中诸人之后,通过朱熹的批评,辨别三人学说与理学的差异,以维护理学家在儒学道统中的独尊地位。


继吕祖谦等之后,《语类》论述的对象是佛道。如果说,批评三人尚属辨异同,那么关于佛道的论述则是辟异端,问题要严峻得多。即使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中国的文化思想界,依然存在着儒佛道三教并峙的局面。这是从董仲舒到程、朱这些自以为正统的儒学家所不能接受的。韩愈开了排释老、明道统的先声,宋代理学家更是以拔本塞源、攘斥佛道为己任。在此所争的,已不是儒学的道统,而是整个中华文化的道统了。朱熹认为:儒家和佛道的根本不同在公与私之别、义与利之别、实与

虚之别。阅读这方面的内容,让人感兴趣的不是那些明确、尖锐的排斥和批评,而是对佛道中一些长处的肯定和感慨。朱熹虽然辟佛,但对那些得道高僧的人格功夫,则十分钦佩,并将这看作是佛教能拥有人才,并能感化众人的一个重要因素。

《语类》最后十四卷所谈的内容,可分四个部分:一是史事,包括当代与历代的史实和人物;二是诸子,包括思想学术史中的著名人物和著作;三是杂类,包括民俗、技艺等;四是论文,包括诗与文。

在这些语录中,最可重视的是对当朝史事和人物的评述。朱熹认为宋代的积弱,是由于朝廷长期“可以有为而不为”;引起靖康之祸的原因,也在宋王朝的决策失误,可谓“处处都是败笔,自亡其国”(《语类》卷一百二十七)。《语类》中有不少关于王安石变法的评论。和当时大多数文人士不同,朱熹对变法并未持全盘否定的态度。他认为新法的出现,体现了时代的需要,是对宋代积弱现状的反应;只是在理财这个最关键的问题上,与民争利,做了忤逆人情的事,贻祸无穷。《语类》中通过一些细节的描述,显示了蔡京、秦桧的狡诈,可谓小人中的才子。在对南宋初年各位名相的点评时,没有为尊者讳,指出颇有忠义之气的张浚,才能却很短缺。精忠报国的岳飞,还是一个“横”人,最后因“横”而屈死。朱熹指出是宋高宗不肯出兵恢复中原,冤杀岳飞,秦桧不过秉承了他的旨意(《语类》卷一百三十一)。当他说这话时,高宗尸骨未寒,其忠忱和胆识,不同寻常。朱熹还看到:当时的人才选拔制度,将有血性、有个性的人才层层剔除,留下的必然是些气宇仄仄的下等人物,并为像辛弃疾那样有“横”性的人才,未能尽其所能而感到惋惜。这些“实录中皆不敢载”的史实,朱熹一一指了出来,当时“看得人头痛,更无有一件事做得应节拍”(《语类》卷一百二十七),至今看来,依然触目惊心,发人深省。朱熹指出:“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语类》卷一百三十六)陈寅恪即据此作《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对唐代的政治制度,作了具体的论述。

黄士毅编辑《语类》,以“作文”殿后,是“明夫文为末,而理为本也”。这是典型的理学家的文道观。朱熹说:“文所以载道,犹车所以载物。”(《通书注》)以文为道的工具,文沦为道的附庸。又说:“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苏轼等文学家由文及道,因文明道,在他看来就本末倒



置了。和其他理学家有所不同的是，朱熹又是理学家中罕见的文学家，他十分重视诗歌言志抒情的作用，尤其重视传统的兴观群怨说，平居于学术研究之余，颇好吟诵诗文。他看到文学在当时的实际影响远远大于理学，对苏轼虽多不满之词，但对其创作成就并不否定，甚至还怀有一定敬意。他评诗论文，颇多灼见，如说“做文字下字实是难”；“前辈文字有气骨，故其文壮浪”（《语类》卷一百三十九）；“陶渊明诗人皆说是平淡，据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觉耳”（《语类》卷一百四十）。非深于诗文之道者，绝难说出。

以上对《朱子语类》编辑的次序及其要点作了简单的清理。世易时移，不同时代有不同的价值取向，朱熹与其弟子当年津津乐道、孜孜以求的，很多已经变得毫无意义。只有关注那些至今仍对人有启示作用、有借鉴价值的论述，这个《语类》选注本，才能符合今人的需要，才有面世的价值，而这正是我们编选注评的标准。

目 录

前言	1
理气太极天地	1
鬼神	12
性理情心仁义	19
为学知行	33
读书法	55
持守力行	68
四书	81
五经	101
政事	118
治道	132
训门人	142
道家佛教	160
宋朝史事人物	173
历代史事人物	199
诸子	205
杂类	209
论文	212

理气太极天地

问：“太极不是未有天地之先有个浑成之物^①，是天地万物之理总名否？”曰：“太极只是天地万物之理。在天地言，则天地中有太极；在万物言，则万物中各有太极。未有天地之先，毕竟是先有此理。动而生阳，亦只是理；静而生阴，亦只是理。”问：“《太极解》何以先动而后静^②，先用而后体^③，先感而后寂^④？”曰：“在阴阳言，则用在阳而体在阴，然动静无端，阴阳无始，不可分先后。今只就起处言之，毕竟动前又是静，用前又是体，感前又是寂，阳前又是阴，而寂前又是感，静前又是动，将何者为先后？不可只道今日动便为始，而昨日静更不说也。如鼻息，言呼吸则辞顺，不可道吸呼。毕竟呼前又是吸，吸前又是呼。”

【注释】

① 太极：《易·系辞上》：“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孔颖达疏：“太极谓天地未分之前，元气混而为一，即是太初、太一也。”指宇宙最原始的秩序状态，出现于阴阳未分的混沌时期（无极）之后。
② 《太极解》：指北宋哲学家周敦颐的《太极图说》。
③ 先用而后体：体，本体；用，作用。
④ 先感而后寂：感，触动，感慨；寂，安详闲静，心志淡泊，无所营欲。

【导读】

“太极”二字出自《易传》。古人认为太极是宇宙万物的本原，因太极运动而分化出阴阳，由阴阳而产生四时变化，继而出现各种自然现象。宋代理学家继承了这种说法：“圣人谓之太极者，所以指夫天地万物之根也。”（《朱子语类》卷九十四）但又认为“太极”就是“理”，即天地万物之理：“太极只是一个浑沦底道理，里面包含阴阳、刚柔、奇耦，无所不有。”（《朱子语类》卷七十五）通过太极与理的合一，将理也提升为产生天地万物的根源，并以此确立了理学的“天人合一”思想。

问：“昨谓未有天地之先，毕竟是先有理，如何？”曰：“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都无该载了。有理便有气流行，发育万物。”

太极只是一个“理”字。

天下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

或问：“必有是理，然后有是气，如何？”曰：“此本无先后之可言。然必却推其所从来，则须说先有是理。然理又非别为一物，即存乎是气之中；无是气，则是理亦无挂搭处。气则为金木水火，理则为仁义礼智。”

【导读】

朱熹论宇宙万物的本体，必兼理气而言。所谓“天下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在说明宇宙本原时，二者是互相依存的基本范畴；但用于解释具体的宇宙现象时，理与气又有各不相同的含义。理是宇宙法则，是自然规律、伦理准则，而气则是构成宇宙万象的基本要素，是万物赖以凝聚成形的物质材料。“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朱文公文集》卷五十八《答黄道夫》）理和气虽然相互依存，但有本末、主次、体用之分。形而上的理是本，是主，是体，理决定气，气依附于理，理在气先。

苍苍之谓天。运转周流不已，便是那个。而今说天有个人在那里批判罪恶，固不可；说道全无主之者，又不可。这里要人见得。又：佃问经传中“天”字^①。曰：“要人自看得分晓，也有说苍苍者，也有说主宰者，也有单训理时。”

【注释】

① 佃：沈佃，字杜仲，永嘉（今属浙江省）人。朱熹弟子。

【导读】

“说天有个人在那里批判罪恶，固不可”，那是对天帝明明白白的否定。而“说道全无主之者，又不可”，则又退了一步，承认宇宙间仍有主宰者。这主宰者不是具备四肢五官、能说会动的超人式的上帝，而是无形无声、不可实指的“理”。因此，人必须依理而行，即根据自然规律、伦理法则规范自己的行为。

天地初间，只是阴阳之气。这一个气运行，磨来磨去，磨得急了，便拶出许多渣滓^①，里面无处出，便结成个地在中央。气之清者便为天，为日月，为星辰，只在外，常周环运转。地便只在中央不动，不是在下。

【注释】

① 拶(zā):逼,挤压。

天运不息，昼夜辗转，故地推在中间^①。使天有一息之停，则地须陷下。惟天运转之急，故凝结得许多渣滓在中间。地者，气之渣滓也，所以道“轻清者为天，重浊者为地”。

【注释】

① 推(què):敲击,压榨。

【导读】

18世纪的西方，在探讨宇宙起源时，出现了以康德和拉普拉斯为代表的星云说，提出太阳系是由一团星云（由大小不等的固体微粒组成）通过运动和相互作用收缩演变而成。生活在12世纪中国的朱熹，虽然在科学思辨上达不到西方那样的高度，但他意识到宇宙万物是由物质的运动形成，依然显示了超越时代的卓见。

地却有空阙处^①。天却四方上下都周匝无空阙，逼塞满皆是天。地之四向底下却靠着那天。天包地，其气无不通。恁地看来^②，浑只是天